



中国人民大学研究报告系列

中国网络社会研究报告

2011-2012

STUDY REPORT OF
INTERNET SOCIETY IN CHINA

主 编 刘少杰
副主编 王建民

013059764

D669.8
32
2011-2012



中国人民大学研究报告系列

中国网络社会研究报告

2011-2012

STUDY REPORT OF
INTERNET SOCIETY IN CHINA



主 编 刘少杰
副主编 王建民



北航

C1665841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D669.8
32
2011-2012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网络社会研究报告. 2011—2012/刘少杰主编.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 3
ISBN 978-7-300-17167-8

I. ①中… II. ①刘… III. ①计算机网络-社会问题-研究报告-中国-2011—2012 IV. ①D66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45114 号

中国人民大学研究报告系列
中国网络社会研究报告 2011—2012
主 编 刘少杰
副主编 王建民
Zhongguo Wangluo Shehui Yanjiu Baogao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邮政编码	100080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010-62511398 (质管部)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版 次	2013 年 4 月第 1 版
印 刷	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印 次	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185 mm×260 mm 16 开本	定 价	42.00 元
印 张	14 插页 1		
字 数	255 000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北航

C1665841

“中国人民大学研究报告系列”编委会

主 任 陈雨露

副主任 冯惠玲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 中	王孝群	毛基业	冯惠玲	刘大椿
杜 鹏	李路路	杨伟国	杨瑞龙	吴晓求
陈雨露	陈 岳	郝立新	贺耀敏	袁 卫
倪 宁	郭庆旺	董克用	韩大元	温铁军

总序

陈雨露

当前中国的各类研究报告层出不穷，种类繁多，写法各异，成百舛争流、各领风骚之势。中国人民大学经过精心组织、整合设计，隆重推出由人大学者协同编撰的“研究报告系列”。这一系列主要是应用对策型研究报告，集中推出的本意在于，直面重大社会现实问题，开展动态分析和评估预测，建言献策于咨政与学术。

“学术领先、内容原创、关注时事、咨政助企”是中国人民大学“研究报告系列”的基本定位与功能。研究报告是一种科研成果载体，它承载了人大学者立足创新，致力于建设学术高地和咨询智库的学术责任和社会关怀；研究报告是一种研究模式，它以相关领域指标和统计数据为基础，评估现状，预测未来，推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转化应用；研究报告还是一种学术品牌，它持续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热点、焦点和重大战略问题，以扎实有力的研究成果服务于党和政府以及企业的计划、决策，服务于专门领域的研究，并以其专题性、周期性和翔实性赢得读者的识别与关注。

中国人民大学推出“研究报告系列”，有自己的学术积淀和学术思考。我校素以人文社会科学见长，注重学术研究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的作用，曾陆续推出若干有影响力的研究报告。譬如自2002年始，我们组织跨学科课题组研究编写的《中国经济发展研究报告》、《中国社会发展研究报告》、《中国人文社会发展研究报告》，紧密联系和真实反映我国经济、社会和人文社会发展领域的重大现实问题，十年不辍，近年又推出《中国法律发展报告》等，与前三种合称为“四大报告”。此外还有一些散在的不同学科的专题研究报告也连续多年，在学界和社会上形成了一定的影响。这些研究报告都是观察分析、评估预测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重大问题的专题研究，其中既有客观数据和事例，又有深度分析和战略预测，兼具实证性、前瞻性和学术性。我们把这些研究报告整合起来，与人民大学出版社资源相结合，再做新的策划、征集、遴选，形成了这个“研究报告系列”，以期放大

规模效应，扩展社会服务功能。这个系列是开放的，未来会依情势有所增减，使其动态成长。

中国人民大学推出“研究报告系列”，还具有关注学科建设、强化育人功能、推进协同创新等多重意义。作为连续性出版物，研究报告可以成为本学科学者展示、交流学术成果的平台。编写一部好的研究报告，通常需要集结力量，精诚携手，合作者随报告之连续而成为稳定团队，亦可增益学科实力。研究报告立足于丰厚素材，常常动员学生参与，可使他们在系统研究中得到学术训练，增长才干。此外，面向社会实践的研究报告必然要与政府、企业保持密切联系，关注社会的状况与需要，从而带动高校与行业企业、政府、学界以及国外科研机构之间的深度合作，收“协同创新”之效。

为适应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的发展趋势，中国人民大学的“研究报告系列”在出版纸质版本的同时将开发相应的文献数据库，形成丰富的数字资源，借助知识管理工具实现信息关联和知识挖掘，方便网络查询和跨专题检索，为广大读者提供方便适用的增值服务。

中国人民大学的“研究报告系列”是我们在整合科研力量，促进成果转化方面的新探索，我们将紧扣时代脉搏，敏锐捕捉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热点、焦点问题，力争使每一种研究报告和整个系列都成为精品，都适应读者需要，从而铸造高质量的学术品牌、形成核心学术价值，更好地担当学术服务社会的职责。

目录

导论 网络化时代的社会变迁	1
一、缺场交往的快速扩展	1
二、传递经验的地位提升	6
三、社会认同的力量彰显	10
四、社会结构的再次转型	15
第一章 渴望真相与寻求对话：解读“归真堂事件”	23
引 言	23
一、网络化时代的“真相情结”	24
二、“低风险关注”与“高风险关注”	28
三、眼见未必为实：被建构的真相	31
四、寻求对话：网络社会中的心理诉求	34
五、从“归真堂事件”看社会分歧	37
结 语	41
第二章 网络互动与社会认同：“郭美美事件”引爆慈善危机	44
引 言	44
一、网络互动：胜似现实的缺场交往	45
二、网络空间：从原子化个体到共同体想象	49
三、社会认同：翻江倒海的精神力量	54
四、网络时代：让社会管理行走在阳光下	58
结 语	62
第三章 网络社会中的传递性经验：从“温州动车事件”谈起	66
引 言	66
一、“温州动车事件”中的信息传递方式	67

二、“穿越时空”的传递性经验	74
三、网络社会传递性经验的积累方式	80
四、信息权力：传递性经验的社会影响	84
结 语	89
第四章 网络意见群体：在围观中影响社会现实	92
引 言	92
一、Web 2.0 催生意见群体	93
二、无边界的信息流动空间	99
三、“麦克风时代”的话语表达	103
四、从围观到行动：网络舆论撬动现实社会	108
结 语	113
第五章 网络权力在成长：今天你上网喊话了吗？	115
引 言	115
一、何谓网络权力？	117
二、网络权力如何发挥效力？	121
三、如何才能使网络权力“健康成长”？	130
结 语	136
第六章 网络动员：“免费午餐”动员中的国家与社会	138
引 言	138
一、“免费午餐”的“五步走”	138
二、网络动员怎样引领国家行动？	142
三、国家与社会如何合作？	150
四、网络动员何以再生产？	153
结 语	156
第七章 网络新媒体时代的公权监督：“人肉搜索”的力量	159
引 言	159
一、从公共交通事故到公权信任危机	161
二、话题转移、舆论焦点与事件性质	166
三、网络新媒体时代的公权监督	169
结 语	175
第八章 网络空间的治理逻辑：从政务微博和网络实名制说开去	178
引 言	178

一、政务微博的“热”与“冷”	180
二、网络实名制之争	183
三、网络空间中国国家治理面临的挑战	186
四、“参与” vs “管制”：两种网络治理逻辑	190
结 语	196
附录 2011—2012 年度重要网络事件	201
后 记	214

导论 网络化时代的社会变迁

人类社会已经进入网络化时代，手机、计算机和互联网触及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网络化发展，向人们展现了十分复杂的变化，其中最突出的变化莫过于缺场交往的快速扩展、传递经验的地位提升和社会认同的力量彰显。而这三方面变化的共同性在于它们都已深入到社会心理结构的变化，是社会结构内在的深层变化，这预示了人类社会将发生一场进入工业社会以来空前深刻的社会结构转型。清楚理解网络化所引起的社会变迁的复杂性和深刻性，明确认识从不同视角形成的关于网络社会变迁的理论的分歧，已经成为当代社会学研究不可回避的重大课题。

一、缺场交往的快速扩展

虽然还有很多人对网络化时代来临的意义并不很清楚，但大部分社会成员都已凭借各种不断提升的网络技术而快速扩展了自己的交往空间。不过，人们利用网络技术开展的交往行为，是一种同传统的面对面的在场交往不同的、隐匿了身体存在的缺场交往。虽然身体不在场的交往在传统社会也存在，但它只有依靠功能强大的网络技术，才能成为一种充满活力的、具有普遍性的缺场交往方式。并且，缺场交往或网络交往过去曾一度被称为虚拟交往，但现在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缺场的网络交往不仅不是虚拟交往，相反却是反应灵敏、传播快捷、功能强大的真实交往。

缺场交往的快速扩展，首先表现在网民队伍的快速扩大。2012年4月12日 www.pingdom.com 网站公布：Internet Worlds Stats 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12月

31 日,全球互联网用户总数大约为 22.67 亿人,在全球 70 多亿人口中所占比例达 32.7%,较 5 年前的 11.5 亿翻了一番。亚洲人在新增网民中所占比例最高,达 53.8%。^①中国网民队伍扩大的速度更是难以预料。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 30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 2012 年 6 月底,我国拥有 IPv6 地址数量比上年底增长 33%,仅次于巴西和美国,位列全球第三。网民数量达到 5.38 亿,互联网普及率为 39.9%。可见,中国网民队伍在短期内快速发展,现在已经接近中国总人口的 40%。

其次,缺场交往的快速扩展还表现为网络交往活动空前活跃。另据美国咨询公司麦肯锡发布的报告,中国 60 个大中城市的居民 70% 的业余时间在网上,小型城镇居民的这一比例为 50%。虽然人们可以质疑麦肯锡的调查结果未必准确,但就我们自己的实际生活而言,每天上网确实占用了很多时间。人们不仅通过互联网了解不断更新的新闻时事,而且越来越多的人通过互联网沟通信息、表达观点甚至评论时事。近两年,一个最令人们兴奋的网络现象是微博的迅速发展。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副主任钱小芊在 2011 年 11 月 21 日开幕的第十一届中国网络媒体论坛上披露:中国互联网微博客等社交网络呈蓬勃发展势头,目前微博用户已经超过 3 亿。又据《第 29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数据,微博用户 2011 年的年增长率为 296.0%。

应当指出,网民队伍和网民活动的扩展不仅仅是数量上的扩张,更重要的是,网民大多数是中青年社会成员,并且是中青年社会成员中热爱生活、关心社会、嗅觉灵敏、思维灵活、积极参与、努力进取的那一部分人。正是这些人构成了一个真实的、有旺盛活力的现实社会。虽然缺场交往形成的社会空间是一个只见语言流动不见言说者身体的符号社会,人们因此而称之为虚拟社会,但形为虚拟的网络社会其实却非常真实,甚至比在场社会更加真实。因为不仅有越来越多的网民真名实姓地发表着自己的话语评论,而且即使是隐姓埋名的匿名者,也真情实意、爱憎分明地表达着对社会生活的陈述与评价。而在那些社会组织、机关团体或群体集会的在场交往中,人们却可能因为某种具体制度的直接规定或特殊环境的限制而呈现出很多伪装与假象,官话、套话、虚情假意、口是心非等是在场交往中司空见惯的假象。所以,网络这个形似虚拟的缺场社会却比貌似真实的在场社会真实得多!

进一步说,缺场交往不仅超越了活动场域或村庄城镇等物理空间的边界,而且

^① 参见《研究显示全球网民已超 22 亿 每秒新增 8 个用户》,见 http://www.chinadaily.com.cn/hqgj/jryw/2012-04-21/content_5735042_10.html, 2012-04-21。

也超越了社会空间的限制。社会空间是近年学术界使用频率较高的一个名词,通常指在特定场域中的由人口、群体、制度、资源、权力和文化等因素构成的社会环境。实际上,这种对社会空间概念的理解同社会结构概念并没有本质区别,但其突出了社会环境的实存性、边界性和间隔性。在场交往一定是发生在特定物理空间和社会空间之中的,因此必然受到个别场域中的各种物理因素和社会因素的制约,特别是受到在个别场域中具有硬性规定作用的制度、资源和权力的制约。而缺场交往却不仅突破了物理空间的限制,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突破了社会空间的限制,网民们可以在广阔的网络空间中展开信息沟通、事实陈述和价值评价。虽然不能完全排除局部环境的空间限制,但具有较强局部性或特殊性的风俗习惯、群体规则、资源局限和部门权力等因素的作用却在很大程度上被淡化了。

麦克纳(Katelyn Y. A. McKenna)和巴奇(John A. Bargh)认为,正是因为对物理空间和社会空间限制的突破,互联网为现实生活中的边缘群体提供了交流沟通的场所。网络活动中的相对匿名性使得人们可以将平时隐藏的价值信念展示出来。通过在网络群体中的互动,以及对群体资格的认定,人们原有的边缘化的社会认同得以强化,从边缘化走向去边缘化。通过对边缘化网络群体卷入程度、边缘化的性别认同群体和边缘化的政治认同群体的研究,麦克纳和巴奇发现,网络群体中的认同反过来也影响到人们在实际生活中的社会认同,形成了“去边缘化”的认同机制,这使参与网络的群体中人们之间的社会疏远和社会隔离弱化了^①,他们指出:“互联网作为一种交流的渠道,具备一种独特的,甚至是革命性的力量,表现为相对的匿名性,与此同时,人们可以相对容易地联系与自己具有相似兴趣、价值和信念的人。”“互联网交流的相对匿名性,身体和非言语互动的缺失,减少了许多具体环境的限制,有助于人们相互间更加容易地形成共享的信念和价值观。”^②

空间界限的突破必然引起空间状态的变化。在传统物理学和传统哲学观念中,物理空间可以呈现相对静止的状态,但在以传递信息为基本内容的网络社会中,空间却一定始终处于流动状态。因此,卡斯特说:“我们的社会是环绕着流动而建构起来的:资本流动、信息流动、技术流动、组织性互动的流动、意象、声音和象征的流动。”^③于是,网络社会呈现的空间是流动着的空间,是从传统社会的眼光看去令人眩晕的快速变化的过程。因此,流动空间要求人们突破面对相对静止状态而形

① Katelyn Y. A. McKenna & John A. Bargh, "Coming Out in the Age of the Internet: Identity 'Demarginalization' through Virtual Group Participation,"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5 (1998): 681-694.

② John A. Bargh & Katelyn Y. A. McKenna, "the Internet and Social Life,"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55 (2004): 573-590.

③ [美]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383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成的各种认知观念和评价原则，以崭新的视野去认识不断流动的空间。

流动的空间还不仅仅是一种空间状态的变化，更重要的是流动已经成为社会空间中的一种支配力量。卡斯特指出：“流动不仅是社会组织里的一个要素而已：流动是支配了我们的经济、政治与象征生活之过程的表现。”^①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判断，对于在社会生活网络化的新形势下如何认识和行使权力具有重要的启示。在过去漫长的政治史中，无论何种社会形态的权力掌握者，都是以稳定的机构和稳定的手段去维持社会的稳定。只要政府、军队、监狱、警察这些国家机器能够被稳定地控制，社会秩序就能被稳定下来。然而，这种情况在今天发生了权力掌握者难以理解的变化。卡斯特称之为：“流动的权力优先于权力的流动”^②，即流动本身就是强大的权力，传统社会相对静止的权力机构在其面前已经遭遇尖锐挑战。

由国家机器行使的权力是实体权力，而网络社会中的流动权力是可以隐匿实体的信息权力。实体权力依托于在场设置，进而有效作用于在场交往；信息权力依托于网络交流，由此而有效作用于缺场的网络交往。于是，这里不仅面临着实体权力和信息权力的关系问题，而且还面临着在场交往和缺场交往的关系问题。暂且不论前一个关系问题，首先就在场交往和缺场交往的关系而言，这是一个很多人已经敏感觉察但未必清楚理解的重大问题。一个最明显的事实是，世界各国政府纷纷加强网络安全管理，而这不仅是因为网络本身存在安全问题，更重要的是以信息交流为基本内容的缺场交往对在场交往已经产生了难以阻挡的影响，实体权力如何有效制约缺场交往，已经变得令人捉摸不定。

事实上，虽然缺场交往隐匿身体并超越了社会空间，但并非完全脱离在场事物而虚拟化，其实质不过是在场交往中已经包含的某些内容的复杂表现。由身体行动在一定实体环境中开展的在场交往，不仅有可以直接观察到的外在客观性，而且一定有不能直接观察到的内在主观性，因为人们的交往行为一定是在主观心理过程的支配下展开的，没有主观心理活动的在场交往是不可能的。然而，虽然在场交往是心理活动的外现，但在场交往并不能把自己的心理活动全部表现于外，一定会受在场环境的影响而隐匿某些心理过程，由此决定了在场交往的两面性。缺场交往超越了实体环境的限制，并因此而使心理活动能够得到比较充分的表达，特别是在特定实体环境中不能随意表达的价值信念和批评言论，也能够比较自由地表达出来，由此显得同在场交往有很大区别。其实，那些在缺场交往中充分表现的价

① [美] 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383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② 同上书，434页。

值信念和批评意见，在在场交往中就已经存在，只不过受在场条件限制而被暂时隐匿起来了。

尽管缺场交往表达的某些思想观念是在场交往中已经存在的，但这并不意味着缺场交往是在场交往的简单表现。缺场交往因其环境的特殊性而一定具有同在场交往不同的特点与功能，其中最突出的是缺场交往对在场交往的导引作用。在传统社会，以信息交流为基本内容的某些身体不在场的交往行为，如信函邮递和电话沟通等，也能起到引导个体甚至群体社会行动的作用，但是因为通讯技术、交往规模和传递速度的限制，信息交流不仅在规模上而且在能量上，都难以达到由网络微博形成的便捷而活跃的效应，进而很难在较广的社会层面上产生缺场交往对在场交往的导引作用。

互联网等新媒体技术的广泛应用，迅速改变了在场交往和缺场交往之间的关系。借助互联网展开的缺场交往，不仅使社会生活增添了新形式，而且也直接影响了在场交往和在场社会的秩序。蔡文之比较深入地揭示了网络空间中在场与缺场之间的矛盾，他把网络空间称为“异位空间”，认为“网上活动进一步推动网络空间作为一种独特的反场所（counter-site）而出现。计算技术在原子与电子、此处与彼处、机构与个人之间带来了产出性混乱，但是这些模糊性正是在用户的各种各样的活动中，才找到了政治上的表达，从而构筑了既是规训的又是无政府的、既是档案类的又是匿名的，既是个人的又是非个人的、既是社交性的又是不露面的网络空间。这种网络空间往往被体验为一个另类空间，一种向我们传统的物理性的社会空间发出挑战的异位空间”^①。

蔡文之所论的异位空间，是其中包含着矛盾冲突的网络空间，并且，不仅这个网络空间本身有着不断的矛盾冲突，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对社会空间的尖锐挑战，并因而引起了现实社会的秩序变迁。^② 面对互联网等新媒体技术引起的社会生活的变化，福山发现在工业社会基础上形成的社会秩序正在趋向分裂，而一种新的社会秩序将会诞生，他指出：“正当西方社会的经济从工业化时代向信息化时代过渡之时，却出现了这样一些负面的社会趋势；这些趋势说明，西方社会中使人们团结在一起的那种社会联系和普遍价值观念正在变弱。”“这些变化本身使 20 世纪中叶工业社会中盛行的社会价值观念形成了大分裂。”^③ 不过，福山对这种“创造性破坏”并不悲观，他相信人类理性可以重新构造新的社会秩序，“社会秩序一旦遭到破坏，就

① 蔡文之：《网络：21 世纪的权力与挑战》，69～70 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② 同上书，70 页。

③ [美] 福山：《大分裂——人类社会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5 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会再次得到重建,而且很多情况表明这种事情今天正在发生。我们可以期待发生这种事情,原因也很简单:从本性上说,人是社会的产物”^①,所以,人类一定会使自己生存其中的社会保持一种相对稳定的秩序。

二、传递经验的地位提升

自 2011 年突尼斯、埃及和利比亚等北非国家爆发大规模的社会运动以来,英国伦敦、德国汉堡也爆发社会骚乱,乃至美国爆发的占领华尔街、占领华盛顿社会运动,这些在不到一年时间内相继爆发的一浪高过一浪的震惊世界的大规模社会运动,都表现了网络信息交流对在场行动的导引甚至煽动作用,人们称之为网络事件的蝴蝶效应或网络助燃。这些遍及非洲、欧洲和美洲的社会运动,不仅充分表现了网络行为对在场行动的导引作用,而且还令人看到或直接感受到一种新的经验正在社会生活中上升为主导经验,这种经验不是传统社会中在特定环境下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局部经验,而是在网络交流中形成的动态不定的传递经验。

吉登斯曾依据电视等电子媒体的迅速发展论述了传递经验 (mediated experience)^②。在吉登斯看来,在高度现代化的时代,十分发达的信息技术和通讯媒体使信息流动空前加速,特别是各种影视技术在人们面前展示了越来越丰富的影像画面,一个似乎可以独立于在场事物的象征系统或符号世界使人们产生了丰富的新体验,这不仅呈现了在场事物同象征符号分离化的趋势,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使传递经验成为人类社会生活中一种基本经验。传递经验是通过信息沟通而形成的超越身体经历和在场事物的缺场经验,是人们通过信息沟通而相互影响和持续传导的动态经验。

应当承认,在互联网和手机通信中形成的传递经验,比起吉登斯所论述的依据电视等影像媒体所形成的传递经验,无论在传递内容和传递形式上,还是在传递速度、传递广度和传递深度上,都已经有了难以估量的扩展和提升。如果人们赞成吉登斯把依靠电视媒体技术形成的传递经验看做社会生活基本经验的观点,那么可以把当前正在迅速扩展的传递经验称为具有主导性的基本经验,因为通过互联网和手机通信形成的传递经验比吉登斯所论述的传递经验已经扩大并强大了数倍。巴奇和

① [美] 福山:《大分裂——人类社会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5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② 参见 [英] 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25~29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麦克纳认为,互联网是继电报、电话、录音机、电视以后的最重要的技术突破,它具有一定程度的匿名性,但同时可以使人们寻找具有相同兴趣和相同品质的同伴,进而跨越距离的阻隔。巴奇和麦克纳考察了互联网对个体生活的心理存在、个人人际关系、群体成员关系、社会认同、工作场所和社群卷入的影响。“在被社会边缘化和污名化(stigmatized)的人群中,互联网上的群体提供了一种新的社会认同。与面对面的交往相比,互联网的交往相对匿名和安全,人们可以投入更多,对网络社群产生新的认同。”^①

把网络中的传递经验称为主导经验,是对同时存在的各种经验的结构关系做出的判断。以经验研究为基础的社会学对经验的结构关系重视不够,缺乏对经验结构的具体分析。事实上,任何时代的经验都是多元的,正如马克思所分析的那样,生产实践、科学实验和阶级斗争,是最基本的三大实践经验。如果进一步分析,还可以划分出审美经验、道德经验等。在传统社会,基本的经验是作用于客观存在的生产经验和科学经验,而这些经验的共同特点是在特定环境中经过人们的身体活动而形成的局部的在场经验。到了网络化时代,凭借现代网络技术快速扩展的传递经验,虽然不能完全脱离各种在场经验,但却获得了越来越大的相对独立性。尤为重要的是,传递经验在网络社会的崛起中成为社会经验结构中的重要构成,并且已经上升为可以引导甚至支配在场经验的主导经验。

犹如福柯等人论述的语词秩序独立化一样,传递经验在广阔的网络空间中获得了一种相对独立的扩散能力与传播途径。虽然从归根结底的意义上说,传递经验的根据存在于在场经验之中,但在网络传播的某段过程或某个环节,网民们依靠不断更新提升的网络技术,大量接受接连不断的动态信息,特别是一些具有强烈刺激性的信息,可以激发一种含有集体兴奋的网络意识或网络情结,网民们可以在持续的信息传递和网络情结体验中积累并扩散传递经验。胡泳在分析这种网络行为形成的传递经验时指出,网络空间中的“地点逐渐变得捉摸不定之后,与地点相关的社区似乎失落了。所以,一种流行的看法是,现代社会是一个庞大的非个人体系,它日益吞噬着大多数人的生活。而在实际上,人们所获得的是一种复合的或者矛盾的经验”^②,正如吉登斯所指出的那样:“已经发生的并不简单地是地域性影响的日渐式微,并变成更具非个人化的抽象体系,相反,恰恰是组织空间经验的形式在变化

① John A. Bargh and Katelyn Y. A. McKenna, “the Internet and Social Life,”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55 (2004): 573-590.

② 胡泳:《众声喧哗——网络化时代的个人表达与公共讨论》,78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着，它以特有的方式把空间上的远与近连接起来，这是以前任何时代都没有发生过的。”^①

这种传递经验的积累与扩散，在非洲、欧洲到北美的社会运动的扩散过程中已经清楚地展现出来。当突尼斯、埃及和利比亚等非洲国家爆发大规模反政府社会运动之时，英国、法国、意大利和美国等欧美国家领导人曾为之兴奋，欢呼民主运动在非洲已经掀起高潮。然而，这些西方领袖没有想到，非洲的动荡局面还没有停止下来，“底层社会的狂欢”在英国伦敦和德国汉堡大规模爆发，并且，欧洲“底层社会的狂欢”又“传染”到美国，占领华尔街、占领华盛顿的社会运动浪潮席卷美国一千多个城市。陈季冰在一篇比较全面评述美国占领运动的文章中写道：“在许多人眼里，‘占领华尔街’运动就是年初点燃的‘阿拉伯之春’在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的翻版，而位于纽约曼哈顿下城的祖科蒂公园，则就是他们心目中的开罗‘解放广场’。”^② 这里要进一步追问的问题是：是什么把远隔万里重洋且在不同制度环境中的社会运动联系起来了？答案还在于网络超越时空限制的“传染”作用。虽然这些社会运动都是在场行为，但都接受了网络信息的强烈刺激，美国的占领运动首先就是由一家名为《广告克星》的网络杂志发起的，网络组织“无名氏”则大力推动了占领运动的进程。从开罗游行到美国占领运动，facebook 和 twitter 这样的网络交流形式都已成为这些大规模社会运动的导引或推手。

从非洲、欧洲和美国社会运动的扩展过程可以看出，传递经验不仅可以在网络中传递扩展，而且网络中的传递经验还可以快速地影响在场经验，以无孔不入的信息流动把间隔于不同环境中的在场经验联系起来，使在场经验也具有了传递性。大量消息证明，从开罗到伦敦直至华盛顿的社会运动，虽然发生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之中，物质条件、政治制度、文化传统等方面都有很大差异，但是在网络交流的传递作用下，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制度环境中的底层社会成员形成了共同的价值追求、政治目标和冲击对象，民主、自由、平等、公正是这场波澜壮阔的社会运动的共同呼声，这是网络交流促成在场经验快速传递的典型事例。正如拉尔（Jeroen Van Laer）和阿尔斯特（Peter Van Aelst）所指出的：“在政治和经济的权力已经逐步进入全球化水平的同时，互联网已经开始把社会运动的展开与运行推向全球化层面。”^③

① [英] 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123 页，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

② 陈季冰：《解读“占领华尔街”运动》，见 http://blog.caijing.com.cn/expert_article-151364-27104.shtml，2011-12-03。

③ Jeroen Van Laer & Peter Van Aelst. “Internet and Social Movement: Action Repertoires, Opportunities and Limitations,” in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13 (2010): 1-26.